

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市场”转型的 经济逻辑与大国使命

——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化战略的转变

张为付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经济步入深度调整期。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治理者, 应当履行大国责任, 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贡献。具体来说, 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 应当完成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市场”的转型。梳理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开放的路径以及转型的逻辑, 并且分析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放战略转变的原因、条件和路径。研究表明: 相对于“全球化 1.0”版本, 中国的“全球化 2.0”要从“注重出口”转变为“出口和进口并重”。目前, 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 传统比较优势与新兴竞争优势在此兴彼弱之际, 中国应当肩负历史选择和大国担当, 完成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市场”的转型。研究为后危机时代中国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世界工厂; 全球市场; 改革开放; 进口贸易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20)01-0001-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分工是国际、国内环境下的历史选择, 四十多年的国际化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为全球提供优质的产品。自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提出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以来, 迄今已有四十二年的时间。在此期间, 中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 切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发展加工贸易, 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 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201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贫困人口控制在 4% 以内; 人均 GDP 超过 9 000 美元, 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是: 依托低要素价格优势, 大力承接外部订单, 发展制造业。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方面, 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要素价格不断上升, 制造业比较优势不断衰减; 另一方面, 自金融危机后, 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发展计划, 国际制造业企业回迁本土成为趋势, 外部需求持续萎缩, 使得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下降。基于此, 必须要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动力。中国全球化战略 1.0 版本主要基于内生禀赋, 承接发达国家订单, 发展制造业, 成为“世界工厂”^[2]。这种战略基于 GVC 分工特点, 完成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始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发达国家反

收稿日期: 2019-09-04; 修回日期: 2019-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TPP 外部约束下我国融入国际价值链分工战略研究”(16JZD019)

作者简介: 张为付(1963—), 男, 江苏徐州人, 经济学博士,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和全球价值链。

思“去工业化”对经济体系的危害,纷纷提出“再工业化”的发展计划。“中国出口和储蓄,发达国家进口和消费”这一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经济发展模式的“再平衡”成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诉求。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调整发展战略,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动能^[9]。相对于“全球化 1.0”版本,中国的“全球化 2.0”要从“注重出口”转变为“出口和进口并重”。目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传统比较优势与新兴竞争优势此消彼长,以进口贸易为主的“全球市场”式国际化 2.0 战略成为我国国际化中新的历史选择和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二、中国担当“世界工厂”地位的历史选择

全球化时代以来,一共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在每一次全球产业大转移中,都会让一些拥有稀缺性优势的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强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内不断深化改革,释放经济活动,塑造增长动能;对外抓住第三次全球转移的机遇,成为“世界工厂”。可以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既是主动选择,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一)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内政策取向

中国对内不断深化改革、释放政策红利,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条件。总结起来,中国的国内政策选择主要有两种:回归市场经济战略和利用比较优势战略。

1. 市场经济战略的回归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经济体制从原先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向由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简而言之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政府主导下,除部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国有企业逐步退出大部分的行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逐步成长。通过不断向市场放权,将原先弱小、无序甚至是混乱的市场经济培育成为强壮、有序和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10]。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丰富多种所有制结构,实行双轨制策略,通过“国家调控+市场调节”逐步完成经济体制改革。英国外交政策中心认为这一发展策略可以和资本主义的改革策略相媲美,将其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已经和“华盛顿共识”一样,成为世界银行鼓励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基石。

2. 比较优势战略的运用

在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逐步实现之后,通过全球市场的开拓,中国较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解决了五六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鼓励区位优势较为突出的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利用东部地区的先发优势,吸纳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提高社会劳动报酬,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的贫困人口。同时积极发展制造业,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40 多年间,中国利用规模优势建立起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成功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11]。

(二)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际环境

1. 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空间

197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也逐步融入全球市场。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2001 年加入 WTO,中国全球化逐步提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图 1 显示我国出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167.6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6.42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1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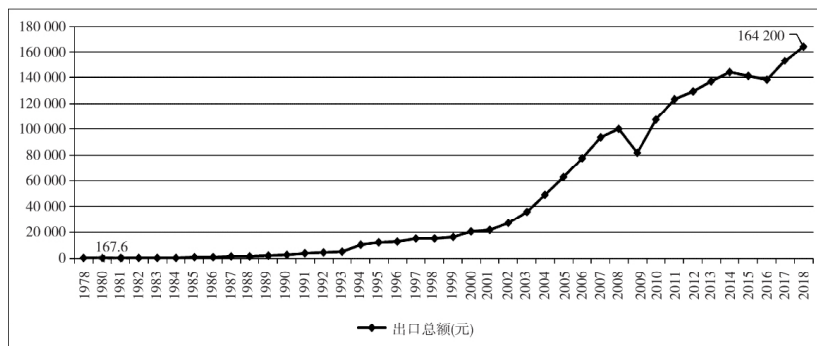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18 年中国出口总额

2011 年是中国制造业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完备、最具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据统计,目前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当中,中国有 220 种工业品产品排名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12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此外,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制造业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出口目的国不断增加^[8]。2018 年,我国对欧盟、美国和东盟的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 7.9%、5.7% 和 11.2%,三者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41.2%。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8.37 万亿元,增长 13.3%,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3.6 个百分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力。其中,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希腊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 24%、23.2% 和 33%。

2. 国际产业资本的利益追求

随着全球制造产业进一步向我国转移,中国优势产业股的竞争力也迅速提升。国际产业资本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逐渐从单独投资办厂,转向与中国企业合作,共同出资办厂。尤其注重通过股权投资、产业基金和天使资本等方式,分享中国企业上市带来的资本市场红利。例如:日本的软银投资中国阿里巴巴,高盛和摩根等投行通过参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剥离与上市,都是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成果。

而境外产业资本作为战略投资的引进,可以赋予中国优势产业股拓展海外市场的优势。因为国际资本不仅仅是财务投资,也希望能够通过股权纽带对中国优势产业上市公司施加影响,从而进军国际市场^[9]。这些国际产业资本在人民币汇率较低的时候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公司治理,帮助中国企业在纳斯达克等国际股权市场上市,赚取丰厚的回报。随后,当人民币汇率提高,再回购美元,赚取高额的汇差收益。

中国优势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优势产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独特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在前期行业低迷之际,聚焦主业,通过产品价格竞争获得了全球极高的市场占有率,然后适当提高产品价格,从而铸就了中国优势产业独特的产业竞争力。随着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产业较为成功地突破了反倾销等压力,迅速占领全球的市场,成为全球产业最重要的供应商。进一步拓展中国优势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依托大国崛起的契机,中国企业逐步完成全球产业布局。

3. 国际产业与生产的转移

自英国“远洋革命”之后,全球经济逐步一体化,产业分工也逐步从各国国内走向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全球经济的常见现象,也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10]。目前,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密集型制造业中,使得其内部产品附加值含量不断提升^[11]。从 1978 年打开国门,再到 2002 年主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中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牢牢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成为全球制造基地。中国逐渐成为第五次产业转移最大的承接国和受益国^[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全球产业转移相结合: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起步,到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冶炼、化工等行业,再到汽车、电脑和手机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直到目前以信息技术、纳米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行业,是一条典型的从 GVC 低端向高端逐步攀升的过程^[13]。40 多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上重要的节点;然后再向中西部地区延伸,将生产和制造业环节向内陆地区转移,逐步构建国内价值链。通过这种国内产业梯度转移,中国逐步实现了从部分富裕走向共同富裕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制度环境

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仅有现实的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是得益于国际多边组织和国内改革开放建立的多项有效的发展制度和不断释放的政策红利。

1. 和谐的国际制度环境

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文明、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二战之后,全球主要国家进行深入的反思,希望建立多边的协调机制,妥善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了建立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设想。随着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经济 + 金融

+ 贸易”三位一体的多边机构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其中,以 WTO 为主的多边体制和以区域合作机制为辅的国际制度是中国经济得以和平崛起的关键。1994 年 4 月 15 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WTO),以取代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拥有 164 个成员国,成员国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 98%,有“经济联合国”之称。

争端解决机制(DSU) 是 WTO 解决全球贸易摩擦最重要的手段,其中争端解决机构(DSB) 则是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机构。争端解决机构由成员国共同参与,受到总秘书处的领导,采用轮值制对贸易争端进行精细监督。成员国受到贸易不正当竞争之后,可以上诉到 DSB。DSB 可以成立专家调查小组,对投诉国进行调查,并撰写相应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会递交给争端解决机构(DSB),该机构是 WTO 的另一项创新举措,用于保证裁决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上述机构对专家的报告有修改和撤销的权利,并且上述机构的报告获 DSB 通过之后,争端双方必须无条件接受。WTO 的各项创新制度为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证。使中国相对顺利地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2. 宽松的国内制度环境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从此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开启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新纪元。

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1978—1984 年), 标志性事件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到扩大城市企业的市场化权利,取得了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的成功。完成了从阶级斗争为纲领向经济建设为纲领的转变。第二个阶段: 改革的探索阶段(1984—1988 年), 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性事件。改革逐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和政治领域,从农村走向城市。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显著的提升。第三阶段: 改革的调整阶段(1988—1992 年), 标志性事件为中共中央作出治理和整顿深化改革的决策。随着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我国既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经验,也带入了一些糟粕; 同时双轨制产生了体制内的腐败,“价格闯关”诱发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这一时期主要用于总结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和教训,整顿市场秩序,完善政策,为实现经济长期发展奠定基础^[1]。第四阶段: 改革的深化期(1992—2002 年), 以邓小平同志南巡为标志性事件。通过对前期的调整和整顿,市场秩序得到规范,塑造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一阶段诞生了我党的两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完善。第五阶段: 改革的全面推进阶段(2002—2016 年), 标志性事件为中国加入 WTO。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入世”目标,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加入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六阶段: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向深水区迈进(2019 年 10 月召开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2]。这一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在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同时,明确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经济水平^[3]。

三、中国成为“全球市场”的时代选择

(一)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期盼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供给侧改革逐步深入,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医疗等新技术领域有长足的进步,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4]。工业化发展阶段进入中后期,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已经率先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城镇化率逐步提高,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不断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圈等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外汇储备居世

界前列,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服务外包不断提高。创新驱动战略开始显现效果,申请专利数连续七年保持全球第一^[14]。

经过七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安全和教育方面的需求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17]。此时,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逐步转变为“出口和进口比重”的发展战略,主动进口国外高质量中间品和最终品。中国近三年,每年旅游服务贸易逆差都超过1 000亿美元,反映了国人对国外高级产品的需求。因此,中国建立“全球市场”的战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18]。

(二) 以中国高质量生产技术整合全球生产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切入全球生产网络,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经济腾飞。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中国和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不断增多。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的调查数量不断上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不断受到限制。随着外需的低迷,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无以为继。挖掘内需市场,建立“全球市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中国作为大国应尽的责任。

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需要在对外开放领域有更大的举措,通过加入高水平的双边合作机制,或者通过签署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协议来达成,如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等。近十多年来,中国研发投入、科技产出和技术能力的快速增长是改变亚洲乃至全球创新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19]。尽管还存在制约创新的诸多障碍,但中国的技术能力及其国际影响力已不容忽视。中国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不仅影响着自身发展,也将对全球创新活动的分布、强度和方式等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面对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和“纵向压榨”,中国要通过以进口为主导的“全球市场”战略,更好地使用外部的资源,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调整政策措施,在全球整合高端生产要素,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用全球的视野,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的调整,进而推动经济转型。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实践

建立“全球市场”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1]。

“任何大国崛起,都需要一个可以依赖的周边依托带。”中国快速发展的成果惠及周边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也应始于周边国家,应该让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培育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产品生产能力,再通过“全球市场”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实现经济协同发展^[22]。将我国制定的政策与周边国家进行对接。如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斯里兰卡的“马欣达愿景”、土库曼斯坦的“强盛幸福时代”、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的“草原之路”对接,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提出的“海洋强国”和“海上高速公路”对接,通过寻求共识,达成合作,挖掘与周边国家合作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繁荣的新动力。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与周边国家一道,建立反映共同需要和深化区域整合的关键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尤其是注重通过内需市场反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得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共享全球价值链增长的红利^[23]。

四、中国国际化战略演进的经济逻辑

(一) 以产品生产服务全球市场,融入全球分工链

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深化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重视对跨国公司的培

养,努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目前,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是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内完成的。因此,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力、控制力,努力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24]。

不断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水平,强化本地企业的生产能力。围绕全面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通过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强化本地企业生产能力,尤其是通过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升级,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25]。

(二) 以比较优势吸引国际资本融入中国制造

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回迁制造业,加上我国工人工资的上升,导致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两端挤压,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核心竞争力的缺失而面临被淘汰。

中国制造业成功的关键在于重构现有的生产体系,再造竞争优势。在开放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需要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有效利用外资,与国外的企业在研发、技术、资本和人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新塑造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实际上,外国投资在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发展迅猛,外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弥补了国内资金短缺,还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境外市场需求,使我国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26]。随着中国资本丰裕度的提高,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为了建立“全球市场”,中国必须要进一步深度开放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利用比较优势吸引国外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重塑竞争优势。

(三) 以服务国际市场建立“世界工厂”地位

中国全球化1.0版本,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出口退税等手段鼓励企业出口,将优质、高端的产品首先服务国际市场。通过打破外贸经营权的垄断提高出口制度优势。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取消门槛限制,使所有履行了法定程序的市场主体都可以成为外贸经营的主体,这标志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改革已走完最后一步。中国认真履行加入WTO的关税减让承诺,中国开放型经济从“多边开放”和“双边开放”转向“单边开放”,三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促进了各个地区以点带面的发展^[27]。我国在金融服务业领域陆续修改和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上为金融市场的充分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8]。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以服务国际市场为目标,逐步成为世界工厂。

(四) 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创建“全球产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社会供给能力的显著增强,我国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有效满足,“需求侧”升级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们原来的“硬需求”呈现出升级态势,不仅在“物”的层面有更高的期待,而且盼望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追求生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境界,由此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求”进一步体现出人民生活的“美好”意蕴,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的更高期待,从而使获得感成色更足、安全感更有保障、幸福感更可持续。可以说,进入新时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文化层面愈加凸显,人民美好精神文化需求愈加强劲。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需求上升规律”;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后果。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融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视野大大拓展,文化消费理念日益更新,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进一步国际化。人们越来越愿意走出国门去感受异域文化氛围、感悟异域文艺经典,对域外文化产品、文艺作品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对世界前沿文艺流派、文艺形式的品鉴力大幅提升。我国广大人民群

众的科学素质、人文素养普遍提高,艺术鉴赏水平、审美能力显著提升,人们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品格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关注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产品的内在品质。此时,通过建立全球市场,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由数量满足型向品质追求型转变的需要。

(五) 以中国产业链优势创建“全球要素市场”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积累沉淀,中国已经建立起全产业链的大工业体系,产业链的优势明显。中国应当利用已有的产业链优势,建立“大产业”格局下的“全球要素市场”。供给侧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更多的要依靠制度和市场经济来提高要素质量,优化要素配置。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大要素进口。利用中国广阔的市场规模和层级优势,虹吸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融入中国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再造制造业的竞争优势^[29]。

(六) 开创以进口贸易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化路径

全球化是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是以资本获取最大限度利润为动力的。金融资本的过度逐利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又加剧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新常态下中国主导的新型国际化是以进口贸易为主导,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化路径,可以有效地帮助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出口,提高伙伴国的发展水平,正逐步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30]。

中国将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培育中高端消费新增长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扩大进口空间。以上海进口博览会为契机,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持续增强广大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邱斌,尹伟. 中国制造业出口是否存在本土市场效应 [J]. 世界经济,2010(7):44-63.
- [2] 任保平. 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 [J]. 学术月刊,2019(8):27-36.
- [3] 门洪华.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与反思 [J]. 学术月刊,2018(11):68-76.
- [4] 刘志彪.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精神和取向——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而作 [J]. 东南学术,2018(4):65-71.
- [5] 刘志彪. 以动态比较优势培育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 [J]. 清华金融评论,2018(7):30-31.
- [6] 沈坤荣,李剑. 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 [J]. 经济研究,2003(5):32-40.
- [7] 刘志彪. 论建立现代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和调整产业结构 [J]. 投资研究,1997(7):2-7.
- [8]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950-959.
- [9] AMITI M. Inter-industry trade in manufactures: does country size matte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4(2):231-255.
- [10] 苏志庆,陈银娥. 知识贸易、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2014(8):133-145.
- [11] 刘志彪. 攀升全球价值链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体会 [J]. 南京社会科学,2018(1):13-20.
- [12] 李萍,杜乾香. 新中国 70 年经济制度变迁: 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J]. 学术月刊,2019(8):37-47.
- [13] 龚晓莺,王海飞. 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发展研究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5):40-49.
- [14] 高海波. 新中国 70 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换的内在逻辑辨析——兼论中国经济发展困境以及“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政府宏观调控”误区 [J]. 学术探索,2019(3):96-102.
- [15] 刘志彪. 理解高质量发展: 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 [J]. 学术月刊,2018(7):39-45.
- [16] 庄芮,杨超,常远. 中国进口贸易 70 年变迁与未来发展路径思考 [J]. 国际贸易,2019(4):34-45.

- [7] 裴长洪. 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 规律与启示 [J]. 经济研究, 2013(7): 4-19.
- [8] 洪银兴.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40 年 [J]. 经济学动态, 2018(4): 19-27.
- [9] 洪银兴. 创新是新时代现代化的第一动力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8(1): 11-13.
- [10] 贺来.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J]. 哲学研究, 2016(8): 3-9.
- [11] 阮宗泽.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世界梦”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6(1): 9-21.
- [12] 刘志彪, 吴福象. “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8): 17-32.
- [13] 王芊霖, 程大为.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贸易治理的贡献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7(3): 221-226.
- [14] 洪银兴.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7(4): 15-25 + 159.
- [15] 戴翔, 刘梦, 张为付. 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攀升 [J]. 世界经济, 2017(9): 29-52.
- [16] 赵文军, 于津平. 贸易开放、FDI 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基于 30 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2(8): 18-31.
- [17] 屠新泉. 我国应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全球贸易治理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2): 15-19.
- [18] BEVERELLI C, FIORINI M, HOEKMAN B. Services trade policy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4(1): 166-182.
- [19] 洪银兴.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9(8): 4-10.
- [20] 刘志彪. 全面深化改革: 基于纵横两条基本路径的战略思考 [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4(5): 54-59.
- (责任编辑: 孔群喜; 英文校对: 葛秋颖)

Economic Logic and Great Power Mission of Transform from
“World Factory” to “Global Market”: On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ZHANG Weifu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deep adjustment. As the main governor of global economy, China should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y as a great power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balancing of world economy. Specifically, as the governor of global value chain, transition from “world factory” to “global market” should be complete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ath of China’s economic opening and the logic of its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nalyzes reasons, conditions, and paths for China’s opening strategy chang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Compared to the “Globalization 1.0” version, China’s “Globalization 2.0” must shift from focusing on exports to “exports and imports.” At pres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has changed, and China’s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emerg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re becoming weaker and weaker. China should shoulder historical choices and assume the role of a great power to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orld factory” to the “global market”.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Key words: world factory; global market;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mport trade